

冲突到共识：1912—1913年报界维权抗争探析

杨晓娟 贺慧桐

摘要

在1912—1913年报界针对政府及租界工部局的抗争中，维护言论自由权利的意识占据主要位置，成为抗争的核心。尽管政府相对于报界而言是强势的一方，但由于报界抗争方式灵活且多样化，抗争进程发展呈现出从冲突对峙到妥协共识的态势。在报界利益抗争的进程中，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抗争意义建构、当政者的民主修养、报人的政治效能感提升等因素直接影响了抗争的成效。民初前两年的报界利益抗争是工具性或非对抗性冲突，并不冲击社会结构，反而起到了调和利益、整合社会的成效。

关键词

民初、报界、抗争、冲突、共识

作者简介

杨晓娟，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贺慧桐，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本文为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民初转型社会新闻场与政治场、文化场互动关系研究：以‘宋教仁案’为中心”的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HB17XW016；河北经贸大学科研基金项目“完善新兴媒体动态监管机制与和谐河北的构建”的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2013KYY16。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nsensus: Analysis on the Protests for Press Right in 1912-1913

YANG Xiaojuan HE Huitong

Abstract

In the press' protes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nd municipal councils in foreign settlements from 1912 to 1913, the consciousness of safeguarding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occupi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and became the core of the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was a stronger force compared to the press, 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test process displayed a trend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mpromise and consensus due to the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protests by the press. In the press' struggle for interests, its effectiveness was directly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the sacredness and inviolability of freedom of speech, the democratic accomplishment of contemporary politician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political efficacy of the newspapermen. In the first two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ess' struggle for interests was an instrumental or non-confrontational conflict. It did not impact the social structure, but played a role in reconciling interests and integrating society instead.

Keywords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ess, Resistance, Conflict, Consensus

Authors

Yang Xiaoju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ster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nd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e Huitong is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This paper is partial achievement of Hebei Province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HB17XW016)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al Relation Between the Press and the Political Field and the Cultural Field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entered on 'Song Jiaoren Case'". And this paper is partial achievement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Project (2013KYY16) "Improvement of the Dynamic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Emerging Media and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Hebei".

翻开民初1912—1913年这段新闻史，笔者发现虽然中国效仿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订立《临时约法》，使结社、言论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成为报界甚至全社会的共识，但政权机构与报界间因限制与被限制“言论自由”引发的冲突却频频上演，愈演愈烈，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种激烈的冲突与对峙集中体现为报界的“抗争行为”，因此，笔者既希望通过报界针对政权机构的抗争行为的类别、抗争过程、影响因素、作用成效等向度的分析，丰富并深化对政权机构与新闻业间互动关系的理解，又希望通过追溯我国言论自由理念实践初期的原始生态，还原新闻自由的发展历程。

一、报界利益抗争类别及概况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初到1913年7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政权机构与报界间因限制与被限制“言论自由”引发的冲突大概就有三十多起,也就是平均每个月都会有近两起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冲突案,不可谓不多,报界对此也展开了激烈的利益抗争。就范围上来讲,抗争遍布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天津、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广州等省市皆有上演。

就抗争的对象而言这些抗争事件可以分为两类:

(一) 报界针对袁政府的言论自由权利抗争

民初处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启动初期,伴随着这种转型,报人作为中国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也随之出现,并用自己坚守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观巩固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但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既希望释放报界的社会能量,又必须垄断政治资源以增强自身的统制能力。一旦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开放,现有的体制是否有能力容纳,在这种矛盾的处境中,政府首先成为报界抗争的对象。

报界针对民国政府的抗争,主要体现为反对“报律”及相关政令的出台。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了《民国暂行报律》¹,希望报界一律遵守,但事与愿违,受到报界一致反对。1912年5月,内务总长赵秉钧以新闻记者程度不足,报纸往往因闹党见而涉及行政官员,甚至有关于国务院会议、军事会议或外交团会议的新闻不实为由,提议重订报律加以限制,并拟将清报律重新删订后使用。报界又一次掀起了“反对报律”的轩然大波。

1913年3月20日,陆军总长段祺瑞令秘书徐树铮撰一部令,知照内务部转谕各报馆,令其在军事外交等事件的报道上务必审慎,不可轻易登报泄露秘密。内务部以外交军事秘密事件漏泄登载,于国家政务大有妨碍为由,训令准陆军部致函京外报纸,“嗣后凡登载军事,均应先行具稿到本部检阅签字后,方准登载。否则一概认为禁止事件,不准滥登。”对于敢于违法报道者予以军法处置、取缔报馆。袁世凯政府强化新闻控制的政令遭到北京各报馆群起反对(申报,1913年3月28日)。

报界对袁世凯政府的抗争,还体现为针对军人干涉报馆的抗争。

1912年6月2日军警督察长乌珍非法逮捕《中央新闻》社员案,是民国建立后军队与媒体间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激烈冲突,也是较早的报界利益抗争事件。冲突源于《中央新闻》登载的两则新闻:一是奉天的赵尔巽、张作霖等与宗社党密谋,预复辟清王朝。二是告白中揭露内务部总长赵秉钧营私舞弊任用乌珍掌握兵权及乌珍

为著名宗社党成员等劣迹。缉探局马某到报社追查新闻信息的来源，反复追问此信息是源于他人广告、读者来信还是采访所得的新闻。报社告知“该稿系读者来信”后，马某继续追问原来稿人姓名。报社未回答，而是与马某协商和平解决办法，即由赵秉钧总长来函辩正，亦登在同样位置。适军警督察长乌珍闻知《中央新闻》指其为宗社党成员，并揭露他能把握兵权皆系赵秉钧运动大为震怒，派其弟及南营参将率大批军警至《中央新闻》报社，捆绑十二、三人，解往南营参将衙门寄监候讯（申报，1912年6月8日^a）。

1913年3月6日，又发生军人干涉西安《国民新闻》事件。事情起因于《国民新闻》有四日均登载军人强暴事件，引起军界不满。二十一团团团长王英率军队到《国民新闻》社，向编辑部索要编辑，并在报馆横行蹂躏，摘去报馆内外名匾后结队而去。事情发生后，西安《国民新闻》社慨然宣言：面对压力，要“秉笔直书，不避权要，发奸摘伏，不畏强权”“为国分忧，为民请命，为三秦言论界树风声”“此心不死，此舌犹存，仍将以一支毛锥敌彼十万横磨，再振霹雳，重张旗鼓。决不因横逆之来，遂稍挫夙昔之锐气”（申报，1913年3月23日）。

1913年7月21日，北京又发生陆军部搜查《亚东新闻》事件。宪兵营排长虞维纲率兵到《亚东新闻》报社谴责该报“所登新闻多有不确”，并奉陆军部命令索阅新闻底稿。该社经理彭佛公回复虞排长，一则新闻是“根据天津《民意报》的电话登载，同时《民意报》亦登载”；另一则新闻是采录北京各报，政府党机关报也登者甚多，并将两新闻底稿交出。虞排长指出：“陆军部公文并非单指此两条新闻，凡关于此项新闻甚多，过去之新闻必索底稿，后发稿须交陆军部核阅。”后陆军部又派一帮宪兵驻扎该社，所有外间寄来访稿信件及德华路透电等均被夺去。对于军人干涉报馆事件，该报向检查厅提起诉讼（盛京时报，1913年7月29日）。

（二）针对租界工部局侵犯言论及人身自由的利益抗争

早在1911年7月9日，上海英租界捕房以“言词秽褻”请廉传讯《笑林报》主笔，恰逢主笔刘束轩因母病回常州原籍，公廉将该报经理盛竹梅传案讯明，罚洋三十元，该报禁止发行，刘束轩改提在案。1912年6月刘束轩回沪后，得知案子未了，就投案自首。捕房未详查案情，以普通刑事案犯对待，将刘铐送总巡捕房。此案引发了报界针对租界列强侵犯言论及人身自由的强烈反抗（民权报，1912年6月23日）。

1912年6月8日，英、美租界内的《爱国报》时评栏内载有“杀不可恕之华人”的词句。捕房以“意图煽惑，扰乱治安”的罪名，由公廉传讯报馆主笔王南无。报

馆请王延、丁榕律师在堂上辩称,“报馆有言论自由权,且前项文词系属来稿,词中并无关碍,亦无不合,是以照登,应请明察”。谏员与英国领事认为《爱国报》所用词句虽是来稿,但未免过于偏激,恐生出意外。所以,今后应择语气和平的来稿登载,并判王南无罪释放(民权报,1912年6月8日)。

1913年4月30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发出“禁止报纸言论过激示文”,内容如下:近来报纸“煽惑攻击公家,过分诽谤责备,以激烈诟詈之言论,足使人心震动,似将扰乱治安”“报纸为民之代表言语机关”“如肆意毁骂,随手乱书”,一经查明,即行收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1983:307)。8月24日,袁世凯政府指派律师以“攻击总统”罪,状告《中华民报》,上海公廨判该报有罪,罚洋四十元,报界以维护言论自由为目标进行了激烈的利益抗争。

就抗争的内容而言,报界抗争主要是围绕言论自由的边界进行抗争。主要分为:

第一,言论自由是否应该被报律所限制。章士钊代表《民立报》发表“论报律”“非报律”两文明确指出,实现真正言论自由的核心问题是“民国是否当容报律发生”。他主张“言论机关绝不受政府之羁绊”,强调报律的存在是对言论自由的“铲除”,应“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民权报》认为共和国应无报律,并代表报界发出“绝不承认报律”的强烈呼声(民权报,1912年5月12日)。

第二,言论自由是否应该被新闻审查制度所限制。譬如,在《亚东新闻》被查时,虞排长指出:“过去之新闻必索底稿,后发稿须交陆军部核阅。”报社彭君云:“此事无论法律上,古今万国无此手续,即事实上亦不能办到。报馆紧要,新闻须在晚一点发稿,陆军部在城内,如送到陆军部来往至速要两点钟,已到五点天明时候了,此说是万办不到的。”(盛京时报,1913年7月29日)内务部以外交军事秘密事件漏泄登载,于国家政务大有妨碍为由,训令准陆军部致函京外报纸,“嗣后凡登载军事,均应先行具稿到本部检阅签字后,方准登载。否则一概认为禁止事件,不准滥登”。此后,北京报界同志会号召报界表示反对审查机制。

第三,言论自由是否应该被保密制度所限制。譬如,1912年9月末参议院曾开秘密会议两次,因报纸多登载其会议内容,参议院请求政府参与调查。于是军警公所致书司法总长许世英,就此事向检察厅起诉。30日京师地方警察厅正式向检察厅提起公诉,由司法警察票传十五家报社。北京各报馆因刊登参议院会议内容得到检

察厅传票后，协同致函京师地方检察厅抗议曰：“参议院会议文件既已中外喧传，北京日本人之报与京津西人之报皆即日登录，而各国之访员之电报亦即日发出。因而报纸所登载者，乃中外喧传之事非秘密之事。”（盛京时报，1912年10月6日）这是因政府以保密为由垄断大量有重要价值的信息，而保密的界限又很模糊导致的。

第四，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名誉权等社会基本价值和公民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是应该靠自律形式还是法律强制规制。对于国家军事秘密的报道属于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间的冲突；报界报道中的激烈言论或秽亵言论对社会安全带来危害；报界的不实报道，会侵害当事人的名誉权。

二、冲突对峙到妥协共识：报界抗争的进程

纵观报界的利益抗争进程，由于民国政府或租界工部局扮演了由强势的主动者到弱勢的妥协者的角色转变，报界扮演了由弱勢的被动者到坚定的抗争者的角色转变，整个进程呈现由冲突对峙到妥协共识的发展态势。

（一）报界针对政府的抗争进程

就报界针对政府利益抗争事件的最初阶段而言，政府基本上都是出于主动，表现得相对强势，有时甚至杀气凌人。相比之下，没有军队和行政资源的报界显得被动而弱势，是被政府官员剥夺言论自由权利，甚至欺压迫害的弱势者。孙中山、袁世凯两位总统出台报律及限制、取缔报馆相关部令，基本上都是政府为防止报界言论自由的无界限对国家权力的弱化和挑战，单方主动限制言论自由，事前并未征求报界意见，说明政府认为报律及相关部令的出台是可行的，且对自己的权威性有一定的自信力。

袁世凯政府甚至于运用军事力量抓报人、封报馆，武力干预新闻报道。在中央新闻案之初，军警督察长乌珍闻知《中央新闻》指其为宗社党成员及他能把握兵权皆系赵秉均运动大为震怒，派其弟及南营参将率大批军警至《中央新闻》报社，捆绑十二、三人，解往南营参将衙门寄监候讯（盛京时报，1912年6月8日）。在《国民新闻》案中，二十一团团长王英率军队持快炮、刺刀、子弹，蜂拥来到《国民新闻》社，向编辑部索要编辑。1913年7月21日，宪兵营排长虞维纲率兵多人到《亚东新闻》报社搜查未果。同日下午七点，又有宪兵二十余人突然来到民主报馆搜查，也声称奉陆军部命令，索要底稿，并将账房陈某抓走（后释放）（盛京时报，1913年7月29日）。

政府的这种强势很快受到了报界的抵制，在报界针对政府的利益抗争过程中，北京报界同志会、中国报界俱进会、上海日报公会等报界团体有组织地灵活运用多元化斗争策略，有力地动员了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力量，使报界作为社会力量，几乎与政府势均力敌，甚至在舆论力上占据压倒性优势，以致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做出妥协。斗争主要方式如下：

1. 利用参众两院支持

《中央新闻》报社被封后，报界俱进会特别大会公决电致参议院，要求该院就内务总长赵秉钧违法逮捕《中央新闻》社职员事，“代表国民”弹劾，“以保言论自由，而重民国约法”。在报界推动下，参议院议员纷纷质问赵秉钧为何违法妄为，蹂躏言论，并要求赵秉钧出席参议院答复议员的质问（申报，1912年6月8日c）。在反对陆军部法令的抗争事件中，报界同志会到参议院请愿，请求提出弹劾案（申报，1913年3月28日）。为赢得参议院的支持，报界同志会特邀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参众两院议员开茶话会，主题就是陆军部取缔报馆一事，“宾客中多为报界抱不平，都谓陆军部太无道理。此次既经同志会向总统请愿，该部苟不怙过，自当早日取消。”（申报，1913年4月4日a）

2. 上书总统请求支持

在反对暂行报律事件中，上海报界首先致电孙中山总统表示万难承认。在《中央新闻》被封后，北京报界联合会两次就军队压制《中央新闻》报馆之事，上书袁世凯。在反对内务部制定相关部令的抗争中，北京报界同志会决定联合报界上书袁世凯要求立即取消命令。

3. 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利益抗争

（1）发函京师地方检察厅据理申辩

1912年9月末，参议院因报纸多登载其秘密会议内容，请求政府参与调查。30日京师地方警察厅正式提起公诉，检察厅根据刑律一百三十三条及二百二十一条规定，由司法警察票传北京报社十五家（盛京时报，1912年10月6日）。

在函中，对于司法厅票传各报馆访员，各报表示反抗。首先，万国报馆通例规定，对于新闻报道由编辑、发行、印刷三种人负责，访员不负责任，按照报馆通例不能追问。其次，事实上，如果遇事追究访员的话，那么还有谁敢为访员，而报馆又不能无访员，于是只有雇用外国人充当访员之一法（盛京时报，1912年10月12日）。面对报界有理有据的斗争，政府所代表的参议院最终妥协，此事遂不了了之。

（2）向检察厅提起诉讼

陆军部搜查《亚东新闻》《民主报》两报事件后，该社社员刘君万、彭侠公因所登新闻均有事实根据，而政府如此野蛮，决定赴检察厅提起诉讼。

4. 调停合议

在《中央新闻》案中，报界公推于右任作为代表出面调停，宴请报界同人研究善后办法，但未达成任何协议。后经多方抗争，赵秉钧迫于压力，与北京报界代表商议和平解决办法。赵称：“此案之发生虽系乌恪谨（乌珍之号）胡闹”，然该报“不应捏造电报诬赵次珊等为宗社党”，所以“只能是咎由自取”。“现在有奉天都督电报，要将该社员等解往奉天办理。赵尔巽都督派人带少数兵队前来迎接，吾思此事，若果将该社员等解去，绝无生理。”报界代表谓：“还望总长推爱顾全大局，施仁免究，则不特身受者感激也”。赵与报界代表达成妥协，决定“留报界面子”。6月5日，《中央新闻》社员一律释放。6月7日，赵秉钧设宴招待北京各报及上海各报驻京记者，宣布《中央新闻》案“和平了结”，并以较低的姿态表示，希望能得到报界的原谅，并力劝报界不要“过于激烈，致生事端”，以求平息纠纷（申报，1912年6月12日）。这样，一场曾经白热化的冲突在双方的妥协下得到了和平解决。

5. 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制造反对舆论氛围

1912年3月6日，《民立报》刊登了该报章士钊撰写的“论报律”一文，这篇署名行严的评论以英国名法官曼斯福、叶伦波和美国柏哲士的理论为据，主张彻底取消内务部报律，“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章士钊，2000：70）。3月7日，《大共和日报》《申报》《新闻报》《民立报》等各报刊登了报人章炳麟的“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他认为“内务部不具有立法资格”，无“作法造律之权”；《民国暂行报律》的立法程序不合法；其内容是否符合法规规范也待商榷。

针对福建警务司彭寿松杀害《民心报》记者黄家宸事件，《申报》表达了抗议：“言论自由共和国之通例，故西欧先进如美利坚如法兰西并无所谓报律者……不谓曾几何时，而小小一福建警务司，犹敢假满清之旧律，摧残我神圣之报馆。”（申报，1912年5月8日）连往日站在袁世凯政府一边的《亚细亚日报》，在反对报律的利益抗争中，也对交通部表示了强烈抗议：

世界共和国多无报律（例如美国），以共和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之权，如有不法

可提起诉讼，无须报律之钳制也。

敢问交通部公等所谓报律果系何机关宣布，何时发表，何以报馆未曾奉到，岂交通部与政府私行规定者耶？（亚细亚日报，1912年6月19日）

1913年4月1日，《大公报》的“闲评一”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对政府的舆论控制加以讽喻，读后意味深长。内容如下：

人问我库伦军事怎样了，有什么消息，我说不知道。

人问我川藏军事怎样了，有什么消息，我说不知道。

人问我边省军务怎样了，有什么消息，我说不知道。

人问我军队布置怎样了，有什么消息，我说不知道。

问者怫然曰：子既从事新闻业，如此重大消息，怎么统通不知道。

予曰：子所问者，非皆军事问题乎？军事问题，非今日政府不许人知道者乎？我心里即使知道，口中只好说不知道，笔下只好写不知道，并且万万不可使阅者知道。

问者曰：如此将来之报纸，不将成闷葫芦乎？

子曰：共和政府与专制政府，招牌虽不同，而其钳制舆论则不妨依样葫芦。有葫芦政府，行葫芦政策，自然迫成葫芦舆论。必待外人搬倒葫芦挖出子，方能打破闷葫芦。则今日军事外交之秘不示人，非报界之危，正政府临时之妙用也。问者乃咋舌而退（大公报，1913年4月1日）。

（二）报界针对租界工部局的利益抗争进程

对于租界工部局与报界双方而言，可分为两个时段，在1912年至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前，租界公廨比报界表现的更强势。当《民权报》记者戴天仇对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财政部长熊希龄等政府高层有激烈反对言论时，工部局直接以刑事犯提票拘传了戴天仇。因“言词秽亵”获罪的《笑林报》主笔刘束轩也被公廨以普通刑事案犯对待，铐送总巡捕房。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报界或动员政府内外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抗争，或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通过法庭辩论的方式进行利益抗争，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双方妥协达成共识，工部局以罚款了事。

1. 请求总统等各级政府支持

《民权报》戴天仇在租界被捕后，《民强报》章佩一、王博谦特致电袁世凯云：“《民权报》记者戴天仇直言犯公，捕房逮捕，外间人言藉藉，疑公以正平待戴。公固长者，岂孟德比，同人深信我公断不出此，乞速电沪省释，以示大总统谦

容之度，而伸民国言论之权。”（民权报，1912年5月24日）在报界公会联络下，通商交涉使陈贻范君就戴天仇被捕事致领事函抗议工部局“以鼓吹杀人四字罗织其罪”，并申斥捕房不应按刑事案处理（申报，1912年5月28日）。

2. 日报公会为发动各界同声支援

《民权报》记者戴天仇被拘传后，日报公会特集合各报馆记者会议，会上朱少屏、章佩一、种朴岑、王河屏等记者认为，戴天仇是上海报界记者之一，因直言被捕房逮捕，应联结各报馆，力争复还言论自由权。会议还决议由日报公会分别致书陈其美都督，即陈交涉使请转诹英总领事复核办理（民权报，1912年5月24日）。在日报公会的号召下，《南京共和实进报》《中华报》《南京中华民报》等纷纷致日报工会转各报馆电云：“《民权报》主笔戴君因论熊希龄借债事致被捕，殊侵我界言论权，我同业自应公起对付。敝社同仁不避汤火。”（民权报，1912年5月26日）

寰球中国学生会的余菊农、张蚀川、王行健等因记者戴天仇被捕致会审公堂云：“《民权报》主笔戴天仇著论评议民国公仆，与租界治安无涉，捕房控告尊处，何故核准，且未经传讯，遽发提票捕拿。”同盟会员陈钧藻也通电各处云：

“戴君天仇因反对熊贼借债召外人变相监督，埃及之祸将及，吾民欲救吾国之不亡，则势必不承认借款。论说时评亦因爱国热诚达于极点而发生，乃捕房以鼓吹杀人为辞，擅捕戴君。况各文明国新闻记者操言论自由权，他人断无干涉之理，且此举诚为爱国起见，岂有禁止他国之人民不爱其国乎”？号召国人“速起而援助之。”（民权报，1912年5月25日b）

3. 租界法庭申辩据理力争

上述租界内的刘束轩案庭审时，辩护律师当堂指诉捕房不合法，并认为应将该案注销。律师丁榕辩称，“盛（经理盛竹梅）作为刘束轩之代表既已受讯罚，刘案自可作了结。且此次登载系转录《采风报》，《采风报》及其主笔亦因该案被讯罚停版，捕房似不应再事苛求。”经过辩论，租界承认“报馆有自由言论之权，公堂自应保护”。但“该报所载过于淫秽”“亦在违章之例”，罚洋四十元了事（民权报，1912年6月23日）。

1912年6月8日，英、美租界内的《爱国报》时评栏内载有“杀不可恕之华人”的词句。捕房以“意图煽惑，扰乱治安”的罪名，由公廨传讯报馆主笔王南无。报馆请王延、丁榕律师在堂上申辩据理力争，终王南无被无罪释放。

袁世凯政府派员到上海公廨起诉“《中华民报》假造事实诋毁政府”，公廨将

总编辑邓家彦传至特别公堂审讯。原告律师状告邓家彦伪造电报、登载不实、扰乱人心、干犯政府等罪状数条。报馆律师到堂辩护说：“报纸有言论自由之权，政府政治不良，报纸有直接监督之职”。“攻击总统”在共和国体下，不能判为违法，“中华民国无取缔报纸之律”，且在美法等共和国，当总统被报纸攻击（时），也“无取缔之法”。“紧要敏捷之消息作为专电”刊登是报馆的惯例，“岂能指为捏造”。报馆并未在这次公开的法庭抗辩中取得胜利，邓家彦假捏事实证据确凿，押牢六个月，罚洋五百元（民强报，1913年8月24日）。

三、报界抗争影响因素分析

（一）“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抗争意义建构

民初报人利益抗争的核心是维护言论自由，对言论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理念的坚定信仰，决定了报界抗争的意义建构，也决定了报界利益抗争的明确目标指向，对报界利益抗争的进程产生决定性作用。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抗争意义是在怎样的“史境”下建构的？它怎样成为社会抑或至少是报界的共识？正如陈金英（2004：2-3）所言：“将某种思想的演变及其结果放在某一段时间去分析是很危险的事情，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对“言论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建构过程的剖析，应以西方言论自由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动态过程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时间点追本溯源从清末开始，共分为三个时间段：维新前后、预备立宪前后、辛亥革命前后。

1. 维新宪政时期对“言论自由权利”的意义建构

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标志着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一次彻底胜利。在沉重的打击中，先是李鸿章发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惨痛的失败证明，中体西用使中国强大是行不通的。康梁维新运动随之兴起，为推动维新变法，赢得各方的支持，康梁等维新派代表人物需要将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借以唤起民众变法，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途径便是通过报刊进行舆论宣传，而办报的前提条件是获得言论自由权利。所以，最早大力宣传言论自由思想的是维新派。1899年8月16日，维新派欧榭甲在《清议报》的“论中国当知自由之理”一文中，认为“口舌者，天之所赋以明义理也”“有无限之权”，首次强调了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文中还指出真正理性、理想之言论自由是“诸子以匹夫草泽之贱备论政体”“构理想而又著书以晓晓天下，与在上者相冲突焉”（无涯生，1899）。1904年，北洋商报主笔杭辛斋阐释了新闻记者言论自

由的宗旨及界限：“扶持清议阐发公理”“为黑暗世界放一线光明。竭囊底之智，支将危之厦。”（大公报，1904年6月28日）1905年3月25日，《大公报》发表“中国报纸将失其言论纪载权”一文，曰：外人“每有一阴谋之暗伏”“各报纸则群起而攻揭”；外人“每有一政策之出现”，各报纸“交口而评论”。“各国虽协以谋我”，但“不敢遽然犯不韪发大难者，其所畏未始不在此。我辈之主持清议者，方窃幸得间接以保国卫民”。“外人狼瞋虎视环集吾前，各逞贪心，伺隙而动”，但“清议所存”，外人“不能不稍有所顾忌”。这里的报纸的言论自由被看作是捍卫国家主权，保国卫民的清议之风。

这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清末最初的传播，其间杂和着中国本土的清议之风。报界都把言论自由的赋权合理性深植于扶持清议、主持清议的传统文化土壤中。传统“清议”的“公正”蕴义，以及它昔日蕴藏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力量，给予了言论自由中国地方传统化的赋权，让言论自由这个概念更富有张力与笼罩力，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活动空间拓展，社会影响力剧增。

1905年11月22日，《大公报》在一篇“论驻粤美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的言论，从传统文化内涵与意义上追溯与解读言论自由为实践“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的新闻记者天职与宗旨的天然条件：“……若以董狐之良史，而禁其直笔，以良平之忠愍，而恶其说，说言是何异？责晁错以尽职，而不许覆妖鸟之巢，立壶涿为专官，而弗任除毒虫之患也，不其僭欤……综其执笔之天职约有数端曰：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大公报，1905年11月22日）传统又一次赋予言论自由的是中国千年史家秉笔直书、谏臣忠君报国、刚正不阿的神圣光芒，使言论自由之风的社会接纳和认可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应该说从清末言论自由概念的舶来，到民初西方的言论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清议、史家、谏臣政治文化的整合基本完成，形成了中国近现代言论自由制度的新传统——言论自由权利深入人心。这种整合可以这样概括：西方的言论自由思想经过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改造被巧妙的饰穿在了传统政治文化内核之上，成为社会认可的重要意识形态。

2. 辛亥革命前后“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意义的完整建构

辛亥革命前后，言论自由写入《钦定宪法大纲》（清末1908）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初1912），成为中国人受到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在法律意义上肯定了“言论自由”的“不可侵犯”。民初政府屡次出台报律限制“言论自由”，遭遇

报界一次次的激烈反抗，其中最为核心的事件是《民国暂行报律》的取消，这充分说明报界抗争“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意义建构的完成。

报界利益抗争行为的动因在于意义的建构与认同，纵观1912—1913年报界的利益抗争行为，主要意义建构于完成保护言论自由的神圣使命。

当二十一团团团长王英率军队干涉《国民新闻》新闻报道时，报社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神圣不可侵犯”为据，抨击王英团长的暴行。当英、美公廨以“意图煽惑，扰乱治安”的罪名，传讯报馆主笔王南无时。报馆请王延、丁榕律师在堂上以“报馆有言论自由权”为据进行申辩，终使王南无无罪释放。在《中央新闻》案中，动员各省报界协力向政府质问时的理由也是“现政府徒弄武断的政策，束缚言论之自由，对共和前途甚为妨害”（民权报，1912年6月8日）。在反对报律的利益抗争中，《民权报》矛头直指内务部长赵秉钧，责其剥夺言论自由权、“违背宪法”（民权报，1912年5月12日）。针对福建警务司彭寿松杀害《民心报》记者黄家宸事件，《申报》在抗议中指出：“言论自由共和国之通例”（申报，1912年5月8日）。《亚细亚日报》在反对报律的强烈抗议中，也指出：“共和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之权”（亚细亚日报，1912年6月19日）。租界内的刘束轩案庭审最后判决中也曾指出：“际此共和时代，报馆有自由言论之权，公堂自应保护”。袁世凯政府派员到上海公廨起诉“《中华民报》假造事实诋毁政府”，报馆律师到堂辩护时的依据也是“报纸有言论自由之权，政府政治不良，报纸有直接监督之职”（民强报，1913年8月24日）。

报界在利益抗争中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灵活多元化的政治策略，并得到上至总统下至各省报界的支持，取得迫使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民国暂行报律》不具备法律效力、政府制定报律的动议就此搁置等一系列胜利，根本原因在于报界为利益抗争行为赋予捍卫“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自由权”的深层意义，而这一意义恰恰是民初全社会的共同认知。

（二）报界与当政者间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

报界奉行的“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实质上是一种不受法律约束的言论自由，类似于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无限自由”。弥尔顿强调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反对政府对报刊的控制或操纵”“政府应当不加限制地允许任何人发表意见，传播消息”。基于这样的理论假设，言论或出版自由成了人身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自由观念在现代被称之为“积极自由”，或被认为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这是所有的人都梦想着一种乌托邦和无限的自由”，即有些“绝对自由”的

味道。而民初报界推崇的“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恰恰与弥尔顿的“无限言论自由观”一脉相承，这也是民初新闻界不成熟的突出表现之一。

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直接的学习对象或者精神来源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对言论自由的明确规定的立论基础更倾向于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限制性“公民自由”，即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公民自由——消极自由，而不是弥尔顿的无限“言论自由”——积极自由。这种理念的截然背离导致在报界与政府间在处理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做了著名的区分。积极自由体现为一个社会整体凭借某种法律制度的保障可以合法实现某一特定行为或目的，即“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涉及的是控制范围，即“我在多大范围内或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或在什么领域内可以合理地不受法律的限制）。积极自由涉及的是控制的主体，即“谁统治我（或政府的合法/政党统治形式是怎样）”（邓春梅，2014：27-28）。

正如西方20世纪初积极自由主义暴露出的弊端扰乱了社会秩序一样，民初报人信守的“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本质上是无限言论自由，催化了新闻媒介“侵犯性”的自然释放。新闻媒体如果滥用新闻自由，新闻失实和新闻侵权现象必然会发生，加之民初政党派别斗争激烈的特殊背景，这一现象的危害性愈加突出。

当报界倡导的“无限”言论自由的社会消极影响渐渐显露，民国初生的政权出于维护稳定与权威的考虑，认为必须对新闻自由加以一定程度的法律限制，否则就要为此付出代价。这直接导致政府对报界的管控加强，其中一些抓报人、封报馆的过激行为不免又严重侵犯了报界的“新闻自由”。标榜弥尔顿无限“言论自由”的民初报人奋起扮演了“绝对自由的斗士”“绝不妥协的民主革命派”角色，自然也就有了报界反对政权机构侵犯言论自由的激烈利益抗争行为。洛克（1689/1964：83）以“人生而自由”为前提来证明社会国家保护自由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为人们正是把“自然法所给予他的那种保护自己和其余人类的权力”转交并委托予它。因此，政府对绝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是对所有公民自由的保护。政府与拥有言论自由的公民，包括新闻媒体编辑记者并不形成对立关系。

但弥尔顿言论自由观的出发点是真理来自于任何意见的自由表达，而“官府对自由表达所施的暴虐”、国家权力机关对公众的批判意识的侵犯是防范的对象。因此深受弥尔顿“无限”言论自由影响下的报界作为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一方，限制言论自由的当政者作为对立的另一方，彼此形成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框定了时

人考察、衡量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的视角。在第一届全国报界俱进会上,《中央新闻》代表王藩的发言是最好的佐证,他认为专制时代的执政者因畏惧百姓宣泄不满,所以各事主张密不宣布,报律遂成为政府用于“污秽历史”的工具和防范百姓的手段。“言论出版既为国民自由之权利,即为报馆不受侵犯之根据”。如听由政府制定报律,“恐限制言论之弊”即因此而生(申报,1912年6月8日b)。王藩的发言表明,他所属《中央新闻》社认为,言论自由无需法律限制。他们认为,政府对媒体言论自由的任何限制都有可能重蹈清政府钳制言论的覆辙。弗雷德·希伯特(Siebert, 1975: 219-226)曾经把报刊与政府的关系概括为四种:限制、管理、扶助和参与,而在民初报人们的无限言论自由观中,就只剩下了“限制”一种,而且维护言论自由的抗争也惯性地具有了政府控制和报刊反政府控制的浓重色彩。在“阻止信息和思想的流动”的过程中,其主角确实是政府,因此非对抗性抗争本没有错。但问题是民初报界政党派别斗争过于激烈,革命派报刊与袁世凯政府一直以来就是敌对竞争的关系,具有强烈的政治权力诉求。特别是宋教仁被杀害后,国民党报刊和政府间呈殊死搏斗的关系。这也是民初报界针对政府,特别是政府制定报律及相关部令的利益抗争行为尤为激烈,政府最终妥协的原因所在。

(三) 当政者的民主素养

总的来看,1912-1913年报界的利益抗争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捍卫了报人的言论自由权利,这与主要当政者面对报界利益抗争表现出的较好民主素养密切相关。

孙中山总统、袁世凯总统、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等政府要人面对由报界的利益抗争引发的强势反对舆论,皆采取了和缓退让等比较策略性的方式对待报界,因此未致对立的双方彼此交恶或纠纷白热化。

譬如,民国暂行报律颁布后,与孙中山意见不合的章太炎撰写《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言辞极为尖刻,攻击南京临时政府,完全否定了新闻立法的必要性。上海报界也致电孙中山总统表示万难承认报律。面对报界强势抗争,孙中山总统并未表示反感,也未据理力争,而是迅速响应民意,虚怀若谷地放下身段接受了新闻界的反对意见,公开表示:“内务部所布暂行报律三章,未经参议院决议,应作无效。”(申报,1912年3月8日)

当北京报界联合会再次就军队压制《中央新闻》报馆之事上书袁世凯,袁派梁士诒代表其接见报界代表。当《中央新闻》揭露内务部总长赵秉钧营私舞弊任用乌珍掌握兵权,并因此被参议院质问甚至于弹劾时,赵秉钧主动与北京报界某人商议和平解决办法。赵称:“此案之发生虽系乌恪谨(乌珍之号)胡闹,”然该报

“不应捏造电报诬赵次珊等为宗社党”。赵与报界某人达成妥协，决定“留报界面子”。6月5日，《中央新闻》社员一律释放。6月7日，赵秉钧设宴招待北京各报及上海各报驻京记者，宣布《中央新闻》案“和平了结”，并以较低的姿态表示，希望能得到报界的原谅，并力劝报界不要“过于激烈，致生事端”，以求平息纠纷。

《民权报》记者戴天仇因在时评中语言激烈，因声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而被捕。《民权报》怀疑这是袁世凯对戴天仇怀恨在心，与租界工部局暗中勾结而为，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外人于我方以敦睦邦交为事，独于此昧昧焉，恐非其初愿也。吾甚望其勿以熊贼之故，以与我国民为难而伤后此之感情也。”（民权报，1912年5月25日a）但当报界上书袁世凯，希望他不要心胸狭隘，以“谦容之度而伸民国言论之权”时，袁世凯还是积极主动派陈贻范交涉使三番五次，费尽周折，以“维护报人言论自由权”为由与工部局协商，最终戴天仇被释放。这与清政府在苏报案中一再要求严惩邹容、章炳麟形成鲜明对比，

当报界同志会就“陆军部违法取缔报馆事”上书袁世凯后，袁世凯迅速传询陆军总长段祺瑞。段称自己并未同意检查新闻，也未认可对新闻媒体军法处置、取缔报馆，是秘书长徐树铮误会竟发布不合法的部令，并承认失察之罪。袁世凯亲自调阅这项部令后，说：“部令如此，无怪报馆之愤激”。于是段祺瑞与内务部商议之前发出的命令未免过于严苛，在事实上碍难实行，应“将陆军部前之命令委屈取消”，以免发生冲突（申报，1913年4月4日b）。

（四）报人的政治效能感

在民初报人利益抗争的进程中，报人们始终表现得正义凛然、理直气壮。这种正义化身的身份认同，源自于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信仰所带来的自信，这对抗争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这种信任感，在政治学上被称为政治效能感，指的是公民认为自己能够对政府产生影响的信念，是一种“个人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政治影响力的感觉，也是值得个人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觉；是公民感受到政治和社会变迁是可能的，以及公民个体能够促使这一变迁发生的感受”（Campbell, Gurin & Miller, 1954: 187）。一般认为，政治效能感是影响民众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对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以及政治制度等均有较强的解释力。民初报人政治效能感的提升，关键性地影响了报人维护言论自由权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

首先，民初的报人们要么有着留学海外的经历，要么接受过新式高等学堂的教

育,有的甚至接受过新闻专业教育,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洗礼,崇尚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在共和制下参政议政的信心和期望倍增。他们中有一些甚至系统地掌握了西方政治理论知识,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有利于他们深入地探讨言论自由权利的正当性,为报人参与维护言论自由权的抗争活动奠定了坚实地思想文化基础。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运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维护言论自由,他们可以自信的引用西方新闻专业惯例来维护言论自由权利。譬如,在戴天仇被捕维权抗争中,报人指出:“今日为共和时代,言论自由,东西所同,报馆文字失检,事所不免。论正当之办法,不过更正而止”“查言论自由,凡是文明之国无不一体尊重,即报章中间有措辞稍涉激烈者,亦不过问”(申报,1912年5月28日)。“泰西各国新闻纸,时有激烈言论,如印度报纸论及英皇,无论发言如何激烈,并不为罪。又如西国预算册内所议一般可杀之人,及闹教等字样。报上常有登载,也未闻有告发者。且文明各国均有言论自由之权。在审判戴天仇时,适逢美领事陪审,辩护律师尖锐的指出,美国是先进共和国,明知被告所发言论,并无不合之处”(民权报,1912年6月14日),却还要逮捕审判,似乎不合正理。

其次,民初有不少报人出身政界显赫人物,也提升了整个报人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国民党的许多元老都有办报的经历,同盟会的创始人孙中山办过《民报》,同盟会的骨干领导宋教仁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并任《民立报》主笔,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于右任在上海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其他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等也有过海外办报经历。这些人同时也是民国政坛要人,孙中山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任农林部总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此外,民初知名报人黄远生、张季鸾、邵飘萍等也接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且有党派背景。因此绝大多数报人对初生的民主政权、政党制度充满了向往,政党认同感较高,对民主共和政府的信任度也较高,政治认知能力也自不待言,他们笃信政府会回应其对言论自由权利的诉求,也更容易相信自身维权抗争的影响力。

再次,政治地位的提升,也增强了报人的内在效能感。晚清时期,报人不齿于士林,政治地位没落。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报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职业认同感增强。报人政治地位的改变与辛亥革命中报刊的繁荣发展,与报人显示出自己具有的强大政治力量密切相关。革命时期,突发性新闻事件的重要性,以及这些事件在越来越多的公众中引起浓厚的兴趣,使报纸在社会生活及各种

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占据头等重要的位置。在革命环境中，具有舆论性、鼓动性和战斗性的报刊或者是展现出这方面作用与潜力的报刊往往让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报刊也由康梁维新时期改良思想宣传阵地转变为革命党人组织革命的中心，助推了革命的进程。辛亥革命领导者孙中山曾言，“共和成功，报纸鼓吹宣传之效，实有以成之也”（黄天鹏，1930：46），充分肯定了报刊在辛亥革命中的鼓动与战斗作用。

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使得报纸更加大胆地发表政论以监督当局，而且也启示了政治组织和舆论的操纵者，使他们懂得了报纸在政治中的作用。政治党派争相公开创办扶植自己的报纸主动参政议政，提高报刊的知名度、影响力，以左右政治发展方向。作为政党的代言人，报纸具有了新的色彩和威严，因此也同时参与到党派政治中。

在报刊政治作用备受关注的时代，报人也由世人眼中的“无赖文人”或者是“斯文败类”一跃成为操舆论大权的“无冕之王”，和参议院、总统、最高法官并列为国家权力机关，与参议院同为舆论监督机关，有监督政府及扶持社会的责任，职任至重，地位至高，人格至尊。陈交涉使致函日报公会中曾言：“报馆主笔是舆论代表，地位清高”（民权报，1912年6月14日）即是佐证。当过报人的姚公鹤也感叹：“今者新闻记者之头衔，唯恐人之不知。其地位之增高，不可谓不速也。”政治地位的大幅提升让报界拥有了可控的政治资源，影响政治的能力得到实际的提升，报人内在的政治效能感自然而然提升。

报纸的新闻舆论功能日益受重视，也推动了报业的迅猛发展，报刊发行量迅速增加。报人不仅薪金待遇提高，而且也渐渐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职业。报刊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各报千方百计谋求报纸自身的生存，这也意味着对报业人才的竞争，名主笔、名记者的身价随之水涨船高，黄远生、邵飘萍成为各报争相高薪延聘的名记者，社会影响力很大。加之民国政坛派系纷争不休，人们关注时政，擅写时评的主笔也备受追捧，成为政界要人拉拢的对象，使报人政治地位大幅提升。

报人们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教育背景，以及官方对待报业和报人的认可与推崇态度，使报人们对自己维护言论自由权利的抗争行为充满信心。政治地位的提升，也让他们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可以在博弈中取得舆论的优势。

四、报界抗争成效分析

总的来看，报界在1912—1913年针对政权机构的非对抗性抗争调和了政府与报

界间的利益，取得了较大成效。

就表层的成效而言：第一，报界的维权抗争阻滞了报律及相关政令的出台。在针对政府的利益抗争中，报界得到上至总统参众两院，下至各省报界的支持，最终迫使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民国暂行报律》不具备法律效力、政府制定报律的动议就此搁置等一系列胜利。第二，报界的维权抗争反抗了军事力量对新闻自由的武力干预。尽管面对军事力量对新闻自由的干预，报人是弱势群体，但《中央新闻》社被捕社员终的释放，陆军部审阅报刊法令的曾经流产，《国民新闻》《亚东新闻》《民主报》等报刊表现出的凛然不屈的报格，足以说明报界对专制强权干涉报业有一定的抵制作用。

就深层的成效而言：第一，抗争进一步赢得了社会对言论自由权的认可。孙中山发布《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该文之开篇，开明宗义指出：“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孙中山，1912）。民国临时总统孙中山作为民国政治上最高权威人物宣布取消“暂行报律”，并公开标榜尊重言论自由，是一种正式的仪式宣告，是对“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认可。第二，抗争是重构民主自由社会价值和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一部分。通过报界的努力，报界所代表的公众舆论不再被当作可以排除在议会之外的“局外人”，而且还使参议院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从而在利益抗争中拥有了可靠的政治资源，改变了原先有利于政府的资源与权力的分布状况。第三，抗争使报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获得提升。就社会地位而言，新闻报刊自我标榜为天然的舆论之母、舆论代表、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就政治地位而言，报界称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在舆论，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不开庭之最高法官，不但可以在报上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点名批评总统；报馆为监督公仆之机关与国务院、总统府具有平等地位，其性质与参议院均同。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维护新闻自由成为关系报刊的公共义务、关系公众公共利益的正义行为，也更强化了报界的政治地位和力量。第四，抗争推动了我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或思潮，对于这样一个“在所有的概念中最不确定、最难以被准确理解的术语”，政府与报界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于冲突，也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它也意味着我国开始在政治学层面有了关于言论自由中服从与强制、在哲学层面关于言论自由中权利与义务（责任）这个核心问题不同方面的回答，是我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开始从传统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标志。第五，抗争催生了报人对新闻自由观念的认识。报界针对政权机构持续激烈的利益抗争，使“言论和出版自由延伸到了新闻自由”，报人中的有识之士开

始理性的思考新闻自由的界限，最终形成类似于欧美国家对新闻自由的一般性理解：（1）出版前免于检查，出版后除了对法律负责任外，政府不得以武力干预新闻报道。（2）报馆有报道、讨论及批评公共事务的自由。（3）访员有接近新闻来源及保障采访的自由。（4）自由传播新闻并免于检查。

（责任编辑：王睿路）

注释 [Notes]

1. 《民国暂行报律》的主要内容：（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得着重科罚。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陈金英（2004）。《走向共和——论1903-1917共和思想在中国的确立》。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武汉。
- 大公报（1904年6月28日）。北洋商报主笔杭辛斋广告。《大公报》，03。
- 大公报（1905年11月22日）。论驻粤美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大公报》，01。
- 大公报（1913年4月1日）。闲评一。《大公报》，02。
- 邓春梅（2014）。《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伯林法价值理论及其发展研究》。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
- 黄天鹏（1930）。《中国新闻事业》。上海：上海联合书店。
- 洛克（1689/1964）。《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 民强报（1913年8月24日）。中华民报判决案。《民强报》，09。
- 民权报（1912年5月12日）。绝对不承认报律。《民权报》，07。
- 民权报（1912年5月24日）。戴天仇被捕记（二）。《民权报》，10。
- 民权报（1912年5月25日a）。熊希龄卖国与戴天仇被捕。《民权报》，02。
- 民权报（1912年5月25日b）。本埠纪事。《民权报》，10。
- 民权报（1912年5月26日）。戴天仇被捕记（四）。《民权报》，10。
- 民权报（1912年6月8日）。言论权又遭挫折。《民权报》，10。
- 民权报（1912年6月14日）。戴天仇案之结果。《民权报》，10。
- 民权报（1912年6月23日）。刘束轩案之结果。《民权报》，10。
- 申报（1912年3月8日）。南京孙大总统复上海报界电。《申报》，01。
- 申报（1912年5月8日）。清谈。《申报》，03。

- 申报（1912年5月28日）。三志民权报之文字祸。《申报》，07。
- 申报（1912年6月8日a）。中央新闻社被封情形。《申报》，02。
- 申报（1912年6月8日b）。北京中央新闻报馆王藩意见书。《申报》，03。
- 申报（1912年6月8日c）。全国报界俱进会大会第二日记事。《申报》，07。
- 申报（1912年6月12日）。中央新闻社员被捕三志。《申报》，02。
- 申报（1913年3月23日）。西安国民新闻被毁记。《申报》，06。
- 申报（1913年3月28日）。北京报界对待陆军部法令之激昂。《申报》，06。
- 申报（1913年4月4日a）。北京言论界之谈屑。《申报》，06。
- 申报（1913年4月4日b）。陆军部取缔条件将次取消。《申报》，06。
- 盛京时报（1912年6月8日）。乌珍宣慰游缉队。《盛京时报》，04。
- 盛京时报（1912年10月6日）。报馆被检举详志。《盛京时报》，03。
- 盛京时报（1912年10月12日）。北京各报馆致京师地方检察厅函。《盛京时报》，01。
- 盛京时报（1913年7月29日）。亚东、民主两报之大奇祸。《盛京时报》，03。
- 孙中山（1912）。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1912年3月9日。
- 无涯生（1899）。论中国当知自由之理。《清议报》，（24），1-4。
- 亚细亚日报（1912年6月19日）。质问交通部。《亚细亚日报》，03。
- 章士钊（2000）。论报律。载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68-70页）。上海：文汇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1983）。《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Campbell, Angus, Gurin, Gerald, & Miller, Warren E.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
- Siebert, Fred S. (1975). Communication and Government. In Schramm, Wilbur L. (ed.). *Mass Communications* (pp. 219-226).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